

徐波◎著



舟山方言与 东海文化

ZHOUSHAN FANG
YAN YU DONGHAI WENHUA

徐波◎著

舟山方言与 东海文化

ZHOUSHAN FANG
YAN YU DONGHAI WENHU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徐波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9

ISBN 7-5004-4549-0

I. 舟… II. 徐… III. 吴语—方言研究—舟山市
IV. 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9662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2

字 数 241 千字

定 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许宝华序*

前些时，徐波君来信，要我为她的专著稿《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写序，我倒并未因忙碌少暇而推辞。八年前徐君来复旦访学，勤于探究，多所交流，给我很深印象。后来或通信，或电话，或晤叙于学术会议，常有联系，彼此均情系于吴语之学。故是篇拙序的写作，可说是同道间的相互关爱和友谊使然，而非我有什么真知灼见要谈。

任何学问，贵在创新。吴语研究亦然。赵氏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就是一部创新的经典性著作，它不仅是我国现代方言学的第一部有代表性的专著，更是吴语研究的奠基之作。它导乎先路，后人步其后尘，经过七十余年来的辛勤耕耘，外延不断扩大，内涵不断充实，因而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均已超越前贤，论文和专著的数量已逾百上千，在内容的阐述和方法的运用上，亦时见创新的亮色。但这基本上偏重于吴方言“本体”的研究，而对作为文化“载体”的吴方言及其与吴文化互相辉映、互动之关系的研究则尚处于“初级阶段”。以舟山方言言之，其于本体研究，前些年已有方松熹先生等的多篇论文和专著《舟山方言研究》这一上乘之作刊布，而于舟山方言与地域文化之关系的双向研究，则涉及尚少，至

* 许宝华先生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

今未见专著问世。唯徐君目光敏锐，善取新知，得风气之先，近年来对文化语言学情有独钟，于课余，于假期，用田野调查所获资料，接连撰写舟山方言与文化两方面的专题论文；积累渐多，以之为基础，整合已有材料，并再进行补充调查，终于完成《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这部专著稿。文稿别开生面，勇于创新，把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本体和载体的双向互动研究。书中采用许多语言实例，特别是舟山方言的特色词语及其涵义，阐述舟山方言跟舟山文化的关系，在沟通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及其互动演变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尝试，取得了可喜的学术之果，从而发展与深化了舟山方言研究，提升了舟山方言研究的整体水平。其鲜明的创新特点，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再说，方言研究，重在调查。这是方言研究的基础工作，不可或缺。本书作者深信此理，不辞辛劳，足迹遍及舟山四个区县和许多小岛。当我们读到富有海岛文化特色的篇章及许多鲜活的方言语料时，仿佛跟随作者一起，也感受到了海风和水汽的湿润，泥土和花木的芬芳，而对作者田野调查的辛劳并无多少体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比喻不历艰险，就不能获得成功。本书作者正是陆海兼程，一路前行，虽然未听说她曾有路遇猛虎之险，然而辛劳和不适的感受总是跟欣喜和收获相伴的。可谓历经艰辛，甘苦备尝。这种敬业精神值得学习和提倡。我国语言资源极为丰富，即以汉语而论，方言之复杂，举世罕见，而学界已做的调查，还很初步，且多是用描写语言学的“老方法”对于方言“本体”的项目不多的记录和描写（如 20 世纪 50 年代的方言普查），进行过深入系统调查研究并有专著问世的方言点还是少数，至于用“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新方法”多视角多层面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则尚处于兴起阶段。方言研究任重道远，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老中青学人，都应重视田野调查。要是能走出书斋，脚踏实地，进行田

野调查,不仅清新的空气有益健康,更可不断获取新鲜的语料,永葆学术之青春而使方言学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或谓理论不重要乎?当然不是。理论与事实(方言语料)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都很重要,但基础工作当是田野调查。由是观之,本书作者数易寒暑,不畏艰苦,坚持田野调查的精神是很可宝贵的,应该充分肯定和发扬。

简言之,《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是一本具有学术价值的好书,值得推介,值得一读。

以上所述,只是阅读《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这部文稿的一点感想,权充序文,不成敬意,恐有负作者盛意,是为非序之序云尔。

2003年岁杪于上海海湾新苑求实斋

李葆嘉*序

虽然生长在黄海之滨的千年古镇，家乡滩涂是丹顶鹤的栖息地，直至插队农村才骑着自行车来到水天相接之处，远观余辉中的海上归帆；也曾有缘坐在礁石上，心境与月色下的渤海波澜共舞银蛇；也曾应邀赴基隆海滩，面对太平洋的千堆雪浪心思浩淼，而却迟迟未及“直挂云帆济沧海”……

如今，徐波君的《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却给了我神游东海的意外机缘。

云海簇拥，渔舟远帆浩瀚；浪山轻托，海天佛国飘渺。沿着“舟山”……“方言”……“东海”……“文化”，我踏浪而来……

—

“舟山”，“舟者，船也”。感由此生——舟山之得名，是海岛如舟而取象，抑或舟聚之山而立意。细阅徐君行文，发觉前人已有两解。《昌国州图志》：“以舟之聚，故名舟山”，或曰：“岛形如海中之舟”。前者言“以舟之聚”，后者曰“岛形如舟”，孰是孰非？查考当

* 李葆嘉先生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所长，语言科学与技术系主任。

地建制沿革，“舟山”之前，此地已有“翁山”古称。而名之“翁山”，是其岛上有山名“翁”。“翁”为何义？无论其如老翁之状，抑或如巨瓮之形，因其岛上无山名“舟山”，故可推定作为地名或建制之名，“舟山”取象于“以舟之聚”。“兴渔盐之利，渡舟楫之便”，“舟聚”盛况之写照也。

舟山之为海岛，古喻“海中洲”。为何名之舟“山”，而不称为舟“岛”？细阅徐君之书，方知舟山群岛共有 1390 座岛屿，其“通名”或“类名缀”凡 8 种：山、礁、峙、岛、屿、岩、石礮、块。以“山”为通名者，或取象于用品，如：畚斗山、纽子山、钥匙山、蓑衣山、酒坛山、斧头山、扁担山、凉帽山、磨盘山、料勺山、楝槌山、枕头山、淘箩山、砚瓦山、花鼓山、琵琶山等；或取象于食品，如：馒头山、梨子山、鸭蛋山等；或取象于动物，如：乌龟山、老鼠山、丫鹊山、牛头山、大鱼山、蟹顶山等；或取象于人体，如：立人山、双子山、九子山、癫头山、大头山、和尚山等；或取象于山色，如：黑山、红山、青山等。凡此海岛，以“山”为类名者最多。

称“海中洲”为“山”而不为“岛”者，古之如此！《山海经·北山经》：“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名曰精卫……。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其“发鸠之山”、“西山”皆为海岛，似有疑惑。然《山海经·海内北经》：“蓬莱山在海中”，则确凿无疑。白居易《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可进一步为之佐证。

查《辞源》：山为“陆地上隆起高耸的部分”，岛是“海洋中的陆地”，乃今人所谓“科学”定义，而非上古或民间通用含义。《辞源》释“岛”举《书·禹贡》：“岛夷皮服。”然何为“岛夷”？《辞源》释：“海岛居民。古指我国东部近海一带，如胶东、渤海湾、江苏等地的居民。”又何为“海岛”？“东部近海一带”。据此解释可知，“岛夷”未必居于后世所理解之“岛屿”之上，反之，上古时期的“岛屿”未必就

处于大海之中。因此,《书·禹贡》传曰:“海曲谓之岛。”所谓“海曲”,《辞源》解释:“犹言海隅。谓沿海偏僻地区。也包括沿海岛屿。”“海曲”或“海岛”,义同“海濠”或“海湾”。显然,“也包括沿海岛屿”是“海曲”或“海岛”的扩展之义。地名“青岛”之岛,盖指古义“海曲”,而非今义“岛屿”。

“岛”之字形,从山,鸟声。鸟声亦兼义,海鸟聚集之处。“岛”之本义即“海曲”、“海隅”、“近海一带”。《辞源》释义是据后起引申义,如左思《吴都赋》:“岛屿绵邈,洲渚冯隆。”晋刘逵注:“岛,海中山也;屿,海中洲也,上有山石。”由此推定,“海洋中隆起的高耸石头陆地”(上无山石者则称之为“沙洲”)名之为“山”,是东南沿海之原生土称。晋人将中古“岛”训为“海中山”,其“山”字亦可作为“海中洲”原称“山”的佐证。这一推定,从家住山东海边的史宁宁学生那儿得到验证。“长岛”全名为“长山列岛”,即“长岛”本岛原名“长山”。她家住长山列岛的“大黑山岛”,本名“大黑山”而“岛”为缀加。

二

从远古开始,隶属于吴语区的舟山方言就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

现代汉语以“方言”对译英语的 dialect,而 dialect 源于古希腊语名词 dialectos(言语)。此 dialectos 是古希腊差别不大可通话的几种土语。西方方言学与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思路是以语言分化为模式, dialect 所表述的就是分化型语言的地方变体。由于中国语言文化与古希腊以及印欧语言文化属于不同类型,因此中国古代的“方言”,既不是古希腊语中口音稍别的 dialectos,也并非现代语言学中的“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

今传《方言》一书，据刘歆与扬雄书信往来及应劭所言，应为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所撰。鲁国尧先生揭出，“方言”一词首见于文献且以此简称书名皆始于应劭。^①后世传本全称《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方言之“方”，非以中原为中心的“四方”之“方”。“方”，邦也。商周有称周边为“土方”、“鬼方”者。“方言”即邦言，“别国方言”即指不同邦国之特色语词。刘歆《遗扬雄书》：言“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扬雄《答刘歆书》自称：其书为《殊言》，“知绝遐异俗之语”。“殊”亦“别”也，“殊言”与刘歆称其“异国殊语”义同。张清常认为：“按照中国古代的概念，方言包括外族语言。扬雄《方言》里面东齐青徐方言包括夷语，南楚方言包括蛮语，西秦方言包括氐羌语，秦晋北方言包括狄语，燕代朝鲜归为一起更不必说。”^②据李敬忠研究，《方言》中几乎每卷都有见于现代南方民族语的非汉词语。^③公元前后，虽然大汉帝国已经建立，但在汉语使用区域仍是以中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北边河套草原是胡狄即阿尔泰语，南边江淮湖海是夷越—苗蛮即南亚—南岛语，西边甘川地带是氐羌即藏缅语。因此记录着汉语及其周边民族“汉字记音式”词语的《方言》，不是一本西方或现代方言学意义上的 dialectology 专著，而是一部搜罗并比较多种语言的同义词语的历史比较词汇学或“中国古典方言学”著作。郭璞赞其：“考九服之逸语，标六代之绝语”，像扬雄这样恣意汪洋、肆心广意的学者，撰著《方言》的旨趣正于此。

古代汉语的语义世界与今人的语义世界存在差别，西方科学系统与中国日常系统存在差别，也可以说，存在不同的语义世界和知识系统。如果一旦混淆，难免出现“从今律古”、“以西方科学系统臆解中国日常系统”的误会。古代汉语中的“语言”、“语”、“方言”是近义词，“方言”一词可依据语境定指不同语言。^④这种通行用法一直延续到清末，其时所谓“广/方言/馆”就是“推广/外国语

的/学堂”。西方语言学意义上的“方言”，汉语习称为“土语”、“土话”、“俗语”或“俗音”。尽管在宋代，“方言”也可偶称土语(如林希逸“乡邦俗语即方言也”)，但转为仅指地方“土语”却是在西方语言学进入中土之后。从词义演变线索来看，其渊源是中古以后偶尔特指用法所导致的词义缩小，其关键是现代汉语对译 dialect 过程中所导致的词义替换。

何为“语言”，何为“方言”？之所以当今世界语言的统计在4000—6000种左右而无法给出准数，除了一些地区的语言调查未能全面或对已知语言研究不够深入以外，关键的问题是因为“语种”(语言种类)和“言种”(方言种类)的划分迄今为止尚无明确而统一的标准。语种的界定，到底是语言学标准还是其他标准？如果坚持语言学标准，那么就要制定“相异度细则”以界定语种，即以多大差别作为区别语种和言种的标准。然而，这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事实：北欧几个国家的语言之间的相异度比汉语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别要低得多，也许与北京话和天津话的差异相若，但从国家或民族角度则必须确定为不同语种。因此，独立的语言或语种的确定并非纯粹的语言学问题，而是一个与民族心理学、政治地理学和历史文化学密切相关的问题。无论是“语种”还是“言种”的认定，都需要依据民族心理认同、国家疆界划定和文化历史渊源。在将西方语言学的 dialect 概念引进汉语方言学领域之时，有必要依据汉语事实对现代汉语方言做一些内涵和外延上的校正。方言的形成既有同一语言的同源分化，也有不同语言的异源交融。而后一种情况，在汉语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尤为值得重视。归根结底，方言的属性是语言的民族文化历史属性。由此可见，现代汉语“方言”不是一个以严格的语言要素特征为标准的“语言学概念”，而是一个以可追溯的文化渊源为内涵的“人文地理历史语言学概念”。汉语方言的划分必须以“汉人移

民周边化”的历史和“周边语言汉语化”的程度为基本依据。由此观之,汉语方言就是历史上逐步形成的汉族民系的“语言文化相”,一部汉语方言形成史就是一部中国移民流播及其接触语言融合史。大到吴语方言区,小到舟山群岛方言,其性质的确定无出左右。

在探讨汉语南方方言形成的历史运动中,有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现象——古代南方土著印纹陶文化的分区和汉语南方方言的区域具有明显的对应性。^⑤萌芽于新石器时期的南方印纹陶文化是分布在长江以南的一种重要古越文化遗存,其繁荣阶段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到春秋时代。依据各自特征,考古学家将其分为7个“次文化区”。除了覆盖式移民造成的江淮语插入宁镇江淮地区(原属于古吴语区),封闭式移民造成的客家话(可能有畲语交融)流播赣南、粤东和闽南一带,还有陆续移民和军事移民造成的平话分布在桂南,南方印纹陶次文化区与汉语南方方言的区域分布大体对应:

1. 宁皖次文化区(原始侗台族山越文化)——徽语区
2. 太湖次文化区(原始侗台族于越文化)——吴语区
3. 赣鄱次文化区(原始苗瑶族苗蛮文化)——赣语区
4. 湖湘次文化区(原始苗瑶族荆蛮文化)——湘语区
5. 岭南次文化区(原始侗台族南越文化)——粤语区
6. 闽台次文化区(原始侗台族闽越文化)——闽东语区
7. 粤东闽南次文化区(原始侗台族骆越文化)——闽南语区

根据考古学界的意见,南方印纹陶是古越族创造的文化,也就是古代南岛—南亚民族创造的土著文化,其语言是原始南岛(侗台)—南亚(苗瑶)语。原始侗台族即百越分布在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原始苗瑶族即苗蛮分布在长江中游一带。如果南方印纹陶文化中不同的“亚文化相”包括了不同的“亚语言相”,则可以推定,汉

语南方方言具有原始南岛(侗台)—南亚语不同支派的底层。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与当地土著的语言特点及其人口密度相关,土著语的歧异性左右着后来形成的汉语南方方言的区域差异性。在新石器时期,舟山原始文化无疑属于南方印纹陶太湖“次文化区”。

三

舟山方言是濒海居民和海洋生态互动的产儿。《书·禹贡》：“江汉朝宗于海。”《说文》：“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何为“海”之初义？二十多年前，本人曾写过《释“海”》、《湖泊称“海”的地理分布》^⑥的札记两则：

海，始见于周代早期铜器，从水，从每。每字从艸(草木初生)，母声，草盛上出也。草木和作物繁茂称之为“每每”。上古西北地区初民逐水草而居，水汇之处则草木丛生。海之初义当指水丰草茂之湖泊。周族原处戎狄之间，由西北而东进至河洛，亦由游牧转为农耕，“海”盖由此传入。《说文》：“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朱骏声按：“海势圆，就地心也；海味咸，湿热之气蒸也；海色绿，穹苍之映云雾不能隔也。”所绘天池之象即西北之盐泽。水丰草茂之处为游牧戎狄所居，故戎狄蛮夷居域亦可称为海。《尔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以“海”指大洋边缘部分盖始自《禹贡》，因其能纳百川，与湖泊之势相类也。

内陆湖通称为湖、泊、泽、淀、潭、池等，亦可称“海”、“海子”。东北的兴凯湖，辽金时称北琴海；镜泊湖，渤海国时称忽汗海。内蒙有居延海；呼伦湖与贝尔湖一带水泽，六朝前称瀚海。苏武牧羊之北海，即贝加尔湖。《大唐西域记》所称大清

池为今伊塞克湖,其时也称热海。新疆的博斯腾湖,《水经注》称西海;巴里坤湖,唐时胡人称婆悉海;另有布伦托海、福海、甜水海等。罗布泊古称蒲昌海,该地区古有楼兰海等。青藏高原有青海(古称西海)、马海、花海子;黄河则源于星宿海。西藏的纳木错湖,义为天池,又称腾格里(蒙语“天”)海。四川有邛海;贵州有草海;云南有菜海子(翠湖)、滇海(滇池)、澄江海(抚仙湖)、左所海(泸沽湖)和洱海等。北京的中南海和北海水域,元时称太液池,明代分为三海,至清代统称西海子。另北京有什刹海,俗称海子。统而观之,称湖泊为“海”主要分布在东北至西北、西南一带,古为“蛮貊之地”。其居民多操阿尔泰语和藏缅语,是源于太古北方细石器考古文化系统的游牧民族。

礼记的旨趣在于试图揭出“海”之本义“湖泊”,概源于上古胡狄语。此说得到一些学人的首肯,但我至今未运用历史比较法详加论证。

如同“海”的语义变迁一样,在中国历史地理上,“东海”也是一个历经沧桑的概念。古“东海”与今“东海”所指海域大有别。《礼记·王制》:“自东河至东海。”注:“徐州地。”相当于苏鲁所濒之今黄海。《战国策·楚策》:“楚国僻陋,托东海之上。”相当于苏北所濒之今黄海。《左传·襄公二九年》:“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相当于山东北部所濒之今渤海。西汉封越王摇为“东海王”,所指为浙江所濒之今东海海域。由此可见,先秦“东海”所指为今之黄海及渤海海域,西汉以后兼指现浙江海域,此后“东海”范围逐步南扩。

“投杆东海,旦旦而钩。”历史上的“东海”多指苏鲁所濒海域以及陆地,郡县建制存在相应痕迹。秦之薛郡地,汉初改为东海郡,郡治在郯(今山东郯城)。东魏所置海州,隋改为东海郡,郡治南移

至胸山(今江苏东海县)。辖境相当于今江苏东海、沭阳、涟水以东和淮河以北地区。唐初复称海州,天宝至德时曾改为东海郡。今江苏东海县为秦之胸县地,北周建德六年改为胸山县,明清称之为海州,1912年改为东海县。吾家乡东台地处苏东沿海,古为海陵地带,县城所在地隋唐时仍为海滩。唐宋以降,虽然大海已东移百里,近年来又长出大片滩涂,但县城内的地名“海叉口子”、“海道桥”、“望海”、“陆家滩子”等犹存。修建于唐代的海春轩塔,据说当时是镇海之塔,屹立千年风雨中,已观沧海变桑田。以宋代范仲淹所修范公堤遗址为界,今东台境内通里下河之堤西地区习称“西乡”,濒临黄海之堤东地区则习称“东海”。仿佛一再告诉后人——此乃东海故地。

长江三角洲流域是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宝地。从远古开始,东部沿海就形成了“捕鱼型沿海文明”。但华夏政治文化中心在河洛地区,因此东亚大陆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仅作为一种边缘文化而存在,也可以说是远古渔猎生活方式的承传发展,始终没有形成像地中海海上贸易那样的海洋文化。唐宋以后,随着经济中心的逐步南移和海外商人来华,东南沿海商贸有所发展。“兴渔盐之利,渡舟楫之便”,舟山闻名遐迩,一度成为东亚著名通商口岸。但随着明代颁布海禁、清代闭关锁国,东南沿海商贸经济长期蜷缩于自然经济的格局之中。

大概从清代开始,才将“东海”一分为二。长江出海口之北,因江、河、淮、沭等河裹挟泥沙而下,近岸海水呈黄色而改称“黄海”(《词源》、《辞海·语词分册》未见“黄海”词条,可见“黄海”出现较晚)。辽东与山东半岛所环抱之海域则称之为“渤海”。而“东海”的名称则让给了长江出海口之南,南到台湾南端一线、东接琉球群岛的广大海域。而在这浩瀚的东海上,舟山群岛如同一串璀璨的珍珠。

四

舟山文化是东亚文化的一部分,东亚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在最近一次冰河期结束以后,距今大约一万多年前,现代人类的祖先从严冬的洞穴中走出来,迎来了新石器革命的春光,相继叩开了“文化”和“文明”大门。英语的 agriculture(农业)和 culture(文化)同源,而 culture 源于拉丁语的 colere(培育),即驯化或培育自然界野生动植物。由此可见,欧洲“文化”的本意就是发端于距今一万年、西方人类学家所界定的“农牧化”(domestication)或考古学家所认为的“新石器时期革命”。与之相关,英语中 civilization(文明)的含义就是“城市化”,城市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标志。根据西方历史文化观,所谓“文化”即农牧化,所谓“文明”即城市化。

与之不同,中国对“文化”和“文明”具有自己的理解。“文化”和“文明”,核心语义在于“文”。《说文解字》:“文,错画也”,交错而画文也。《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文”即文身、纹饰之本字。根据考古文化学研究,可以推定古人从以色彩线条可文人之身、文器之饰,发展到以“文”记事,出现文字或文辞。所谓“文化”即修饰化或文字化,在商代最终形成礼教文化。商民族自称为“商”,其字形取象于“祭祖”,^①但在周代文献中通常称其为“殷”。“殷”字的本字是其左边字符,《说文》:“作乐之盛称殷……《易》曰:殷荐之上帝”,其义是商王功成作乐,祭祀天地以配祖考。之所以周人称“商”为“殷”,盖因为承袭了商人乐教文化或礼乐制度。在华夏先民的语义世界中,“文化”和“文明”之“文”,为文饰、为文字、为礼教。“文化”一词通常分释为“文治和教化”,刘向《说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明”一词通常分解为

“文采光明”、“文德辉耀”，如《易·大传》：“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尽管中国古代文献中存在“文化”和“文明”的字组，但是用之分别翻译西方的 culture 和 civilization 则始自近代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文化”和“文明”，实为来自东邻日本的借形词。根据古代中国人的理解，所谓文化即“以文治教化之”；所谓文明即“以文采或文德而昭明”。两相对照，西方的“文化”观呈现出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明显特色，偏重于物质技术化；而中国的“文化”观则具有修饰主义和人伦主义的丰富意蕴，偏重于精神礼教化。

人类文化是生存环境的适应和精神世界的建构。在东亚东南沿海地区，河姆渡文化是最为原始的东南考古文化的古老遗存之一。该遗址一带约在距今八九千年前成陆，其时平地山丘生长热带、亚热带植物，热带动物栖息于山林。无论是七千年前的干栏式建筑、耜耕稻作，还是对鸟和太阳的崇拜，都反映出姚江古河道滋养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虽然河姆渡人已经发明了农业，但渔猎仍是不可缺少的活动。带有尖锋倒刺的扁长形鱼镖、残留在陶器中的鱼骨、手工制作的小陶鱼，还有绘有鱼藻纹的古陶盆具，这些都表明生活在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人已经“饭稻羹鱼”。依据河姆渡遗址最底层出土的船桨和小陶舟，也可以推知他们已能制造跨越江河湖海的独木舟。河姆渡文化一期以后的 46 处遗址，除了分布在从萧山至宁波 200 公里的古海岸线一带，在舟山群岛也发现了几处河姆渡文化晚期遗址。距今五千年左右，河姆渡人已从象山渡海到达舟山群岛。因此可以推定，最古老的舟山方言就是“古河姆渡话”。而河姆渡人的体质特征显示他们属于南亚种群，因此可以推定古河姆渡话属于原始夷越即南岛语。虽然现在尚无从证实现代舟山或杭州湾居民是河姆渡人的后裔，但同样也难以否认河姆渡人的血液可能依然流淌在浙东人的血脉之中。这方面的结